

## 一个女战士的足迹<sup>①</sup>

### 讲述者

谢月香（1922—1994），出生于香山县翠亨石门乡。1935年考入石岐仙逸中学就读初中，1938年在中山县联合高中就读，1939年参加中山青年抗日先锋队，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至1946年在五桂山从事党的群众工作、妇女工作等；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山县委执委兼组织部长、五桂山区委书记、青年团筹委主任、县妇联主任，县委委员兼青妇委书记，省政法干校政治教研室教员，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党总支委员、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负责人，省农业厅基层党委委员等职。



谢月香

### 重返五桂山

我是五桂山区人，虽然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多年，但我小时候是在家乡长大的，客家话和客家风土人情都熟悉，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便于开展群众工作。因此，我积极向上级要求返回山区工作。

我妹妹谢月珍早已返回五桂山石门工作，可能考虑避免我们姐妹俩都暴露，因而组织上原先安排我去石岐郊区长洲教书，做地下工作。后来，

<sup>①</sup> 摘自：《一个女战士的足迹——谢月香同志纪念专集》，中山市妇女联合会、中共中山市五桂山镇委员会、中共中山市翠亨村委员会、中共佛山市松梅新村总支委员会合编。略有改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组织听取了我的意见和要求，才批准我回五桂山区工作。

1942年农历8月15日下午，一个乡民兵队长把我带到五桂山区的灯笼坑。在这里我以小学教师的名义开展群众工作。我被安顿在一间有一房一厅一厨房的小泥屋里居住。小学就在旁边的一间小祠堂里，学生约30多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级都有几个学生。一个班上课，其他班的学生就抄写作业。除了白天教书外，我们还办了夜校。晚上是三四十个青年来读夜校。他（她）们除上课认字外，更喜欢唱抗战歌曲。原来，前一年曾有一位抗先队的老师在这里教书，教过他们不少抗战歌曲。

这里都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因此，我和这些学生、家长很快就熟悉起来。山区很穷，教员每月的薪金才50元法币。开始还够买米，后来法币贬值，我还得回石门老家背些粮食回来煮饭。但是，由于群众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生活上的困难就不在话下。

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还属于地方党，而在当地的工作则受部队领导，可谓双重领导。但我们搞群运的同志不公开承认是部队的人。一方面是因为敌人经常来，我们怕走避不及；另一方面也避免连累群众。所以一般都以教师身份出现，并不直接公开与部队联系。有时候需要接头，也是在离开村庄的山头树林中见面，以免群众看到。我为了掩护身份，不说是石门人，而说是马溪人。这样做有时也招来麻烦。我刚到灯笼坑不久，有一个去过澳门的妇女认出我是谢金连的女儿（因为我父亲是归侨，在家乡有点名气）。有一次，一个夜校的女学生嫁给我的表弟。结婚3天后，新郎陪新娘回娘家拜祖，正好是要在小学所在的祠堂拜祭。我见他们来，便借口有事离开祠堂回住处回避。有些年纪较大的学生还问我：“老师，你家乡明明在石门，为什么又说是马溪人？”弄得我颇费口舌解释。其实，许多群众心知肚明，猜测到我是游击队的人。

我在灯笼坑，部队领导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当地的阶级状况。我通过学生和家访，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而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青年和其他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并逐步发展吸收党员，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

除了小学上课、办夜校外，我通过教唱抗战歌曲、讲时事、讲故事以及家访等方式，很快就把几十个青年发动起来，也熟悉了学生家长，群众

中逐步出现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当时，有3个从澳门培侨中学初中毕业回来的青年（2男3女），很快成为我的知心朋友。通过教育，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我动员那两个男青年到刘震球的集结队集训了3个月。后来他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入了党。叫黄彩娥的女生成为我的好助手。许多个晚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彻夜详谈。我对她进行抗日形势、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并在送她到部队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介绍她入了党。还有一个女青年叫黄木兰，家庭是中农，家人害怕她到部队后家里会遭受敌人烧杀，因此不准她读夜校，不准她接近我们，晚上很早就关上大门不让她出来。然而，黄木兰不顾一切，想方设法每晚都来夜校读书，晚上回不去，就在学校厨房的草堆里睡觉。有时，还偷偷地帮我们送文件、送情报。半年后，我动员她去参加部队的妇女干部学习班，回来后也介绍她入了党。入党后，她干脆离开了家，支李瑞英同志一起搞民运工作。另外我还介绍一个叫黄顺英的青年入了党。不久，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1943年4、5月，地下党组织派了高以萍同志来邻乡白企。她也是以夜校教师的身份掩护开展该乡的青年和妇女工作，与我同一个小组。9月，高以萍调去搞妇女训练班，先后由林妃同志及杨芙同志接替她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组织调我去合水口乡工作，我的岗位就由黄彩娥接替。

### 壮美的革命爱情

合水口乡早在抗日游击队到来之前，就有地下党员刘志光（邓展明）同志在这里教书，开展群众工作。游击队后来进入五桂山区，也是经他搭桥引线。校长刘震球是个华侨子弟。他与该乡农民凌子云一起，组织一批青年搞防匪保家、维护乡村治安的工作，颇得当地群众尤其是青年的信任。1942年春，通过地下党的介绍，他俩首先支持协助抗日游击队在合水口立足，并以梁伯雄部队的名义组织了一个中队。党先后派了刘南、郭大同等同志去当指导员。这个中队实际上是专门用来培训当地青年的一个集训队。从这里培训出来的青年，许多后来参加了革命入了党，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女青年的培训工作，则在平原地区另有学习班）。

我到合水口乡接替的是刘志光同志的岗位。敌人仍时常来“扫荡”，所以我仍不能以游击队队员的身份出现。除教书外，我还负责包括灯笼坑、白企等整个片的党的工作。

合水口乡集结队（即民兵），有男女青年共六、七十人。我不但教他们认字、学文化，更主要的是开展形势教育，使他们认识国共两党当时对抗日的态度。我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降日反共的种种罪行；用活生生的事例描述共产党军队英勇抗日、解放了中国大片土地、组织民主政权、领导农民减租减息、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过幸福生活的情景；说明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取得国家民族独立，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妇女才能翻身。通过这些宣传教育，青年和妇女觉悟逐步提高，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游击队打击日、伪军。

青年们对抗日游击队很崇敬。他们希望能请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来同他们见面和讲述游击队员的生活和战斗故事。为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写了个小字条，让民兵队员设法转交给游击队大队长欧初同志。过了几天，欧初同志因事没有来，却派来了一位高高大大、态度和蔼，二十六七岁的青年领导人。他笑眯眯地自我介绍叫肖强，是欧初同志叫他来给青年们上课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副大队长。

他向青年讲话时，带有很重的东莞口音，声音宏亮、很动听。他讲述的游击队生活和战斗故事，使青年们听得入了迷。他们热切希望他以后有空多来讲课。所以，后来每隔十天八天，只要游击队没有调防，他就来给青年上课。

肖强同志来上课，是由我接待的。上课前或讲课后，他常常在我学校的小厅休息。这时，他就把最近的国内外大事以及部队的情况向我详细叙述。还说让我掌握这些资料，以后他不能直接来给青年讲课时，我可以用此去教育青年；部队有任务交给我，也由他转告。有一次，几位部队领导同志没有口粮，他来找我向群众借米。我通过黄彩娥向老乡借了几斤米。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们更熟悉了。有一次下课后，他到我的住处，询问了我的情况和经历，也谈了他个人的情况。他曾经结过婚，家庭要他结婚后才放他外出工作。离家不久，妻子生了个男孩后就过世了。他还说，欧初同志派他来讲课，是有意让我们相识，给我们创造接触机会。他

那爽直的性格、奔放的感情逐渐吸引了我。我们相爱了。1943年10月，组织批准了我和肖强结婚。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只能秘密结婚，根本不可能举行婚礼，对外也不宣扬。

婚后不久，伪军43师政工队由一营伪军护送，从石岐到翠亨办训练班。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谢立全、谭桂明、欧初、肖强等带领抗日游击队30余人在崖口王屋村进行伏击，毙伤敌人20多名，缴获机关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20多支。

这时，正是我和肖强结婚后没几天。那晚夜校下课后，我和党的发展对象余华娇已经入睡。大约午夜一点多钟，余华娇的弟弟从路边小店回来，很惋惜地嚷开了：“部队今晚打了个大胜仗，缴获许多枪支，可惜肖队长被子弹打中大腿，流血过多牺牲了。”我听到这消息，人像傻了一样靠在床边。只听到华娇追问她弟弟：“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弟弟说：“我们正在小店聊天，见到部队同志扛着战利品回来，也抬了一个担架，肖队长躺在担架上，部队同志沉痛地说，肖队长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我听到这消息，像被重锤打在头上，差点昏死过去。我呆呆地靠在床头，呆呆地不会吱声。而华娇已是泣不成声：“哎呀，肖队长这个人多好啊，人又和气，讲课又生动。这样好的人牺牲了，多可惜啊！”

华娇虽然是我的教育对象，我们亲密地在一起，但她还不知道我和肖强已经结婚。因此，我还得控制自己，眼泪只能往肚里咽，不敢放声大哭。昏昏沉沉中，我见到肖强并没有死，只不过是负了伤。他还对着我笑咪咪的。我高兴地醒来，马上叫醒华娇，说：“肖队长还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我看见他啦！”华娇也高兴地说：“是呀，我也梦见他啦，他没有死，只是受了伤。”

起床后，我们匆匆吃了早餐，就赶去学校，想从部队驻扎的那个村子的学生中探听确实的消息。刚到学校，村里几个学生就围了上来。他们都很难过地告诉我们：“昨晚部队在崖口打了个胜仗，缴获了伪军许多枪支。但是很可惜，多好的肖队长却牺牲了。”有个学生说：“我爸杀了一个公鸡，敷他的心脏也救不过来，失血太多了。”有个学生说：“为避免敌人报复，部队匆匆忙忙买了个棺材，埋藏在后山。”……听了这些，肖强牺牲已是铁的事实了。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痛。但我还要控制自己，不

能嚎哭，更不能倒下。中午，肖强的警卫员来取我为肖强缝补的大成蓝衫裤，更引起我的难过。下午，我硬撑着坚持给学生上课。放学后，只剩下一人时，我呆呆地站在学校门口，望着远山：“今天下午该是他下葬的时候。”部队领导怕我暴露，虽同在一个乡，也没有叫我去见他最后一面。不多久，中队的郭指导员参加完葬礼回来，刚好路过，见我在暗中流泪，便说：“今天下午送葬的弟兄数十人都哭了，难为你啊！但明早敌人就有可能来‘扫荡’报复，你要小心啊！”

当晚，上夜校的青年提出不上课，说肖队长牺牲了，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开个追悼会吧！几十个青年男女，在默哀时哭成一片。我再也忍不住了，同他们一起哭了一场。我含着泪在讲话中指出：“中山游击队是抗日救国、打击日、伪军的。肖强同志是部队领导之一，他是为了打击日、伪军，使人们不做亡国奴而牺牲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一切办法，拥护和支援我们的游击队。”

第二天傍晚，游击队在邻村贝头里召开了祝捷大会，许多村民扶老携幼前去参加。同学们也担着募捐来的大米、番薯、茶果（点心）慰问部队。祝捷会开得十分热烈，充分反映山区人民对部队的拥护和爱戴。

### 反“十路围攻”中智斗伪军

1944年农历正月初七，我正在夜校给青年上课，刘震球中队的一名队员通知我马上到刘中队长家开会。我立刻赶到刘家，见到该乡集结队队长等好几位同志都已在座，还有一位是分别多年的抗先队老上级阮洪川同志。我以惊讶的眼光看了他一下，他只微笑点点头，却不敢相认叙旧（因为我那时是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出现）。我坐下后，阮洪川同志开始传达一个紧急情况：已收到准确情报，敌人明天一早就要对五桂山区游击队进行“十路围攻”。敌人一路从南朗方向进犯我们这个乡，然后准备用半个月时间，配合其他九路敌人联合搜索我主力部队，企图一举消灭我们。各乡民兵（即集结队）要配合主力部队打麻雀战，晚上骚扰敌军驻地，使敌人进入山区后首尾难顾，日夜不得安宁。

会后，刘震球即带领中队去白企乡。我与民兵队长则回去向青年男女作传达部署：一、青年妇女和集结队员分组到各村去传达动员。不到一个



位于五桂山大帽山的粉碎日、伪十路围攻主战场旧址

小时，全乡群众都行动起来，把带不走的粮食、衣物掩藏好，然后全部撤到山上隐蔽；二、集结队员留下来轮流在村内巡逻；三、翌日清晨4时起，集结队员到从南朗进山的路口站岗放哨，几位女青年则拿着锄头在田间劳动以监视敌人；四、敌人如果在村里驻扎，则设法进行骚扰。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果然从南朗方向进犯。他们还没进村，分散在各个山头上的集结队员就这个山头打几枪，那个山头打几枪，打完枪后立即转移。敌人听到哪里响就往哪里追，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却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深入，在田心村占了一些大屋住了下来。傍晚早早进入营房，关紧营门，不敢出来。

利用夜幕的掩护，集结队员在敌驻营房周围打冷枪、敲铜锣，还用脸盆盖着爆竹燃烧，发出类似爆破的响声，并大声呐喊，使敌人整夜不得安宁。

天亮以后，敌人分成小组到各村搜索粮食衣物，一无所获。不得已派了两个伪军，一个荷枪一个挑担，前往南朗采购粮食和肉菜。这情景被在

村边放暗哨的妇女看到，她们立即通知集结队员。当这两个伪军从南朗挑着担子回来的路上，伏击的集结队员把他们捉住带到山上，进行了教育，警告他们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他们很受震动，决意逃离日、伪军队。

第4天一早，敌人又疯狂地到各村搜寻粮食。那天我刚好与在村边放暗哨的余华娇谈话。一个没带枪的伪军来了，见我们只有两个妇女就扑上前来要搜我的身。等他到跟前时，华娇情急生智，大喊：“集结队快来呀！”伪军一听慌了，立刻转身逃跑。我马上伸手抓住他衣领不放，余华娇也连忙拖住他。这时，几个荷枪的集结队员赶到，把他带到一间屋子，对他进行一番教育，警告他不要欺压杀害群众，还要他争取立功赎罪。他答应后就把他放了。岂料他返回驻地后，却大喊大叫，说看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敌人忙乱了一阵子，组织几十人跑步前来搜捕。这时，我和余华娇以及集结队员早已离开，翻过一个山头，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掩蔽了下来。敌人上山见不到一个身影，乱搜一番，又不敢久留，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几处房屋，就撤回了驻地。敌人进山几天，白天找不到游击队踪影，搜不到粮食，晚上没法安睡，又发现有荷枪实弹的人，恐慌而不敢久留。当天下午，就全部狼狈逃回南朗老巢。

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逸仙队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与敌人周旋，并伺机袭击敌人。最终，敌伪原打算一个月的“十路围攻”计划，仅5天就被粉碎了。

#### 【延伸阅读】

### 粉碎日伪“十路围攻”

1944年春节前，日军千余人（其中骑兵100多名），伪军第43师、第30师和5个护沙总队，合共8000多人，拟分兵十路（合水口、白企、灯笼坑、鳌溪、长命水、石鼓埕、永丰、崖口、白石、马溪）围攻五桂山区，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万人大扫荡”。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预先获得情况，于1月23日在石莹桥召开军事会议，针

对日军准备向五桂山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制定了“全面牵制，击敌要害，攻其一路，动摇敌阵”的应战策略。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七），日、伪军兵分十路开始围攻五桂山区。指挥部部署逸仙大队、义勇大队共600多人、民兵100多人投入战前准备，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并派出主力队布防于石莹桥山岭，扼守敌军必经之路的大帽山制高点。是日清晨，日、伪军一路约千余人（其中100多骑兵）经牛爬石进入石莹桥时，遭到游击队和民兵伏击。敌多次进攻均被击退，遂于下午撤走，其余九路敌军被游击小分队用“麻雀战术”拖住，多日无法前进和互相策应。指挥部把握战机，于2月3、4两日，派主力队插进平原地区，在一、二区部队和六区民兵的配合下，乘虚袭击驻石岐、唐家之日、伪军巢穴。各小分队同时四出袭扰日、伪军，并破坏公路桥梁和通讯设施。各路日、伪军在四处挨打，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于4日晚全部撤离五桂山区。

此战共毙伤敌人120多人，缴获步枪18支，烧毁敌兵营一座，并截回物资一批。日、伪军原计划一个月的“十路围攻”，仅5天就被中山抗日军民粉碎。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